

快言快语

工资“专职协商”并非治本之策

刘义昆

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做客人民网时透露,目前全总正积极推动国家有关部门加紧制定《工资条例》。此外,今年全总将投入1000万元在10省市试点聘用专职工会人员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今后职工加班工资、奖金分配、福利补贴和薪酬制度设置等应纳入到协商之中。(7月21日《京华时报》)

在集体协商普遍乏力的大背景下,全总试点“聘用专职工会人员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无疑是在推进工资集体协商方面作出努力。这样的“专职协商”应该会有一些的实际效果。广东省劳动保障厅有关负责人曾表示,在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推行工资集体协商,普遍存在“四不现象”:企业不愿谈,担心协商工资损害了企业方的利益;职工不敢谈,担心提出协商要求被企业解雇;职工对相关工资法规政策不熟悉不会谈;工会组织不健全不能谈……由全总出面,聘用专职工会人员,无疑有利于上下级工会之间的沟通,有利于工资集体协商的推行,对改变“四不现象”当然是有帮助的。但工资难以协商,困难并不止于此。一方面在于,“从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来看,工资集体协商是一种选择性的或者是柔性的规定,并非强制性的”。另一方面,一些工会内部人士认为,在私营企业,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被视为核心秘密,工会和工人很难掌握企业准确的经营数据,所以很难科学地提出工资上涨的具体幅度;一些私营企业则担心被工资集体协议“捆住手脚”……这些“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的现实阻力,恐怕不是进行“专职协商”便能改变的。

无疑,“专职协商”并非治本之策,而“集体协商”才是根本。诚如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所言,“工资协商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协商工资,更是涉及到整个劳资关系基本权利的实施问题。”唯有让劳动者有与经营者对等谈判的地位,最后协商的结果也才能真正保障双方利益。全总要推出“专职协商”了,这体现了全总对工资协商的重视,但需要指出的是,“专职协商”只能是“集体协商”的辅助手段。若将希望全部寄托在“专职协商”之上,恐怕会导致喧宾夺主,出现“集体协商”被架空的局面,长此以往,恐怕反而会对工人的权益产生伤害。

头条评论

正言

2000年底完工的长风大桥位于205国道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境内,根据设计标准应抗百年一遇洪水,2001年7月被浙江省交通厅质监局评定为“优良工程”。该桥建成以来,当地并未遭遇百年一遇的洪水。然而今年4月份,投入使用不到10年的大桥开裂并被重修。(7月20日《海南日报》)

陈岚桦

近日,一篇《把大院子属错当信访对象误打》的帖子在互联网上广泛转载。6月23日上午,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黄仕明的妻子陈玉莲在湖北省委大院门口,被6名便衣警察当成信访人员暴打16分钟,事后,公安机关道歉称“打错了”,是误会。而据了解,这6名警察是公安部门设在省委大院的“信访专班”人员。其职责是“接待”上访人员的。后经记者核实,网帖所述基本属实。(7月20日《南方都市报》)

乐南

清华大学披露,今年九成省份的理科第一名和近三成省份的文科第一名被清华录取。而之前北大称,全国各省份文科第一名中,除两成报考香港高校外,六成以上被北大录取。针对这对互相矛盾的数据,北大和清华招办有关负责人均称自己的数据“没问题”。20日,清华大学再次回应,高校不应在“第一名”数量上斤斤计较,应把精力放在招生改革和学生培养上。(7月21日《北京日报》)

“桥裂裂”裂出管理之殇

为了让读者直观地感受到“桥裂裂”的厉害,笔者不妨赘述一下出事大桥的情况:4月12日,居住在长风大桥旁的馮家村村民樊日剑突然看到大桥上出现了手指大的裂缝,一会迅速扩大到40厘米左右,可以伸进去一只脚。有关方面勘查认为,共有10组桥墩的长风大桥的7号、8号墩基已被水流冲刷脱落,9号、10号墩基也受到严重冲刷。目前,大桥7-10号桥墩和20多米桥面被迫拆除重建,直接经济损失可能逾千万元。

对于桥梁,笔者绝属外行。不过,对于一座全长仅270米、宽10余米的大桥来说,居然在未满10岁就发生天折,也的确令人匪夷所思。毕竟,有长50米、宽9米多的屹然挺立了1400余年的赵州桥在那里屡抗洪

峰、遭地震、遇战火,这10龄桥还真有些愧对先人;毕竟,面对上海外白渡桥在100岁高龄时,每天还承载着3万多辆汽车通过的桥事,衢州有关部门怕也是哑口无言;甚至,早在建桥期间,便有小儿发现桥基下面是黑色的煤炭层而不是坚硬的岩层,但不知为何设计和施工方还是“矢志不渝”?

知情者一语道破天机:杭(州)嘉(兴)湖(州)等地早在上世纪就采用先进的打桩桩基。但建长风大桥的时候,衢州经济不发达,建桥基本采用的是扩大基础桩,相对来说造价低、时间快。又是一座政绩工程!这样的工程虽然造价低,但时间快,完全可以满足有关人员的这“献礼”那“献礼”的心愿,这样的

工程虽然质量有优,但却极易拉动GDP增长,建修拆之间无不流着“GDP政绩”的“欢愉”;这样的工程虽然危害公众安全,但没出事啥都好办,你看,当地有关部门不是已经积极地拿出整改措施,正树立自己的“亲民爱民”形象吗。

不由得想起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的女儿、全国政协委员茅玉麟在谈到近些年出现的桥梁事故时所说的话。她认为,中国的桥梁事业是走在世界前沿的,在桥梁设计、施工、监理各个方面的水平都没有问题,出现事故的主要原因暴露出管理体制的问题,比如工程的层层转包问题,转到最后一道时,施工经费只剩了一半,怎么保证了施工质量呢。

遗憾的是,近年来,类似“桥裂裂”的事件还层出不穷呢。抛开其“叔伯兄弟”“楼脆脆”、“楼垮垮”不说,就拿其“亲兄弟”而言,就有同样获评“优良工程”的黄石长江公路大桥在竣工7年后发生垮塌,不得不再次投资7000余万元,进行大修;就有同样获评“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的南京汉中门桥竣工仅仅1年便出现30处断裂;就有才建成3年的重庆彩虹桥突然整体坍塌,导致40人死于非命……

但愿,此次“桥裂裂”能够裂出一些被隐瞒的运作黑幕,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在每一条江河之上;但愿,此次“桥裂裂”能能为建筑史上的最后一次“桥殇”,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放心地行走在通畅的大路上。

“打错门”凸显信访维权之艰

陈岚桦

为,“打错门”事件这个带有黑色幽默色彩的事件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如果说把大院子属错当信访对象属于误打,那么,正常的信访对象就可以拳打脚踢。这种将群众正常的信访视为洪水猛兽的做法,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即便在炎炎夏日,笔者读到这则消息时,也感到一种渗入骨髓的寒意。退一步说,即便警察当时是对待罪犯,也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定,更何况面对的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寡妇。当我们的执法者在公然施暴时,普通民众究竟还有没有伸冤的地方,这几乎是在挑战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

信访制度,本来是公民正常的一条利益

表达渠道。由于基层民众意见难以以上达,加之基层司法不公的客观存在,当下,民众对信访渠道充满了希望。而个别地方政府、个别公职,却习惯性地对群众正常信访进行打击、压制。甚至有部分地方政府还将信访者当做“刁民”和“破坏安定团结分子”来消极应对,就连一些省市“驻京办”也成为围追堵截本省上访人员的“有生力量”。

于是,从北大教授孙东东的“上访专业户99%有精神问题”言论到湖北省委大院门前“忠于职守”的公安人员误打“自己人”的乱行,我们分明看见了基层百姓信访维权的日益艰难。而从“打错门”事件中湖北公安系统的表态来看,这一句“误会”,引发的社会反感,恐怕也已超过了事件本身。

或许,一些地方政府认为合理的疏导远不如“堵”来得更为干净利落迅速。殊不知,这样简单粗暴的办法更会加深政府和人民对立的鸿沟。如果这种沟通民间与庙堂的渠道被一种“鸵鸟政策”人为封闭的话,势必造成更大的社会矛盾。

笔者认为,发生在武汉的这一起“打错门”事件,放在全国来说绝不是一起孤立的治安事件,而是从侧面反映出上访户所面临的险恶现状。在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为政者唯有化“堵”为“疏”,耐心倾听民间的疾苦,以坚守社会良知和正义的底线为原则,还应当事人以公正,才能从根本上避免“打错门”的尴尬局面。

如何呢?可为他们营造出一种的成才氛围,使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为他们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培养计划,使他们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在各个领域脱颖而出?

还是听听温家宝总理的大实话吧。去年教师节前夕,温家宝总理就教育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第一个问题就谈到了杰出创新型人才培养。他说,“我们的学生也是很优秀的,在各种国际比赛中经常名列前茅,许多到国外留学的学生学习成绩也很好。但确实很少有像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那样知名。每每想到这些,我又感到很内疚。”一语惊醒梦中人!争到了那么多的高考状元,却不能将其培养成出类拔萃的人才,这样的争抢是否已步入歧途,甚至沉疴缠身了呢。一事惊醒梦中人,清华大学终做出反省:应将精力放在招生改革和学生培养上了。

北大清华状元之争是沉疴缠身

乐南

说实话,在听惯了数据注水新闻的当下,笔者最初对这起争论还真没太留意。毕竟,对于一些高考状元,早有多次排名世界亚洲大学榜第一的香港大学屡屡作出拒录的决定;对于这些状元的发展,也早有调查显示,他们大多事业平平,并未成为职场状元;而对于国人的状元情结,也早有教育部一再强调,支持素质教育,不得炒作高考状元。

但是,对于两所名校为了争状元甚至不惜撕下脸皮,互称“老大”的做法,笔者仍感到了不小的困惑。是什么让北大清华这样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对高考状元如此执着追求呢?是什么让“勤奋、严谨、求实、创

新”的北大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在争辩中失去了应有的矜持?

反思一下近年来于象牙塔内盛行的浮躁风便不难得知:有状元借力,便能争抢到更多的生源,捞进更多钱财;有状元借力,便能标榜自家的实力,自吹天下第一;有状元借力,便能支撑虚无的面子,赚取坊间声誉。君不见,不仅清华大学今年对省级状元开出了学校奖励4万元,各院系提供几万元的奖学金等诱惑;甚至还有浙江师范大学承诺,对录取的该省文、理科前100名学生,奖励人民币20万元……但是,各高校争抢高考状元后的结果



新书浏览

玩岛屿:最美岛屿度假攻略

本书即搜罗现今最受游客喜爱的岛屿,包括泰国苏梅岛、菲律宾长滩岛、马来西亚兰卡威、日本巨岛、美国关岛等地,介绍当地最热门的海滩和旅游胜地,并搭配优美的图片、实用的地图和相关资料。此外,还规划了热门度假村清单,并罗列必玩水上活动,可以说,本书是目前坊间有关岛屿度假的书籍中,最具参考和实用价值的一本。

中国旅游文化

人类的旅游活动固然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说,是人的内在需求,是文化驱动的结果。《中国旅游文化》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旅游活动,研究旅游产生、发展乃至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内在原因,《中国旅游文化》不仅注重对旅游现象的纵横比较,探讨旅游行为运动变化的机理、发展趋势,按照一定的理论方法对未来的情况进行预测,而且有助于旅游活动的全面发展。

书界访谈

云南省教育厅长罗崇敏的第十八本专著《天鉴》引发京湘沪等地学者热议,罗崇敏接受本报记者访谈时称:要建构自己的话语系统

简约语录体 素履著奇书

本报记者 梁昆

去年至今以来,有着“改革书记”之称的中共云南省高校工委书记、云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罗崇敏的第18本专著《天鉴》,以其思想的先锋作用、缜密的理性火花,建构起个性化的新的话语体系,引发了京川云粤等地学者的热议。2009年3月,在罗崇敏的主导下,云南中小学掀起了一场减负行动,从而引发了广泛关注。近日本报记者赴云南采访,亲身感悟了这位擅长改革的官员作家的理性魅力。他在云南红河主政期间,推动乡镇公推直选、农村医疗改革等领域多项极具争议的改革而声名远扬,他的作品也因杂糅思想与妙趣而炙手可热。他的第18本专著《天鉴》去年四月出版以来,印数已达10万余册。

冲击官场文风 简约语录直抒胸臆

《天鉴》是罗崇敏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积淀。“那天我在家整理记录,朋友看到我在飞机上的卫生袋背后也写满了东西保存下来,便建议我把这些整理出书。”于是,就整理出版了《天鉴》。

罗崇敏被媒体誉为“改革官员”、“奇官”。在云南红河州和蒙自等地,他曾“先斩后奏”、“特立独行”、“大刀阔斧”地搞过各方面改革;最大规模的乡镇长直选;全州医疗卫生系统全员社会化;户籍制度、文化教育……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7项改革,影响深远。

书话·文史撷英

2001年春,我校(南开大学)中文系张铁荣教授陪同上海陈福康先生来舍采访,此我初识福康,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福康眉宇间,时透奇气,畅言其所著有关郑思肖《心史》研究之成书,名《井中奇书考》,不久即将出版,届时当相赠。8月间,果然收到《井中奇书考》一书,都40余万字。封面由选堂题署,选堂者,香港学界耆宿饶宗颐先生,而扉页则为百岁老人章克标所署。福康于赠书扉页所写赠词之首,加盖“桃花潭水深千尺”一语,福康亦于扉页写“水用八卦中坎为水之意以代水字,暗示友情,别有风趣。”

读书

30余万字的《天鉴》,以随笔文体、语录的形式,论述了治国之道、齐家之道、养生之道、经济发展之道、文化艺术之道等,它的简约语录体的方式,体现了作者的家国意识、担当胸襟和人格情怀,也完成了作者自己在书中之人格塑造。

广东省文联党组书记白洁、广东省评论家协会主席蒋述卓等40多位作家和评论家认为,在泛文字读本时代,取得这样的成绩十分不易。

日前在上海召开的《天鉴》作品研讨会上,20多位京沪文化界学者座谈时,《天鉴》以短小精悍的随笔文体,娓娓道出了作者对当前地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诸多方面的前瞻思考,翔实记录了一位党的基层领导干部在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所思所想,展现了作者深邃的眼光、独特的思维、理性的批判精神以及唯真、唯实、唯勤、唯和、唯廉的价值追求。无论是为官员、为学者还是普通读者,《天鉴》均是一部可读可鉴的作品。

上海大学文学院执行副院长、历史系教授陶亚飞在评论《天鉴》时说,该书作者罗崇敏不畏现代官场“言多必失”的文风,敢于真实地记录自己履职期间的所思所想,生动展现了一个现代官员的胆量和气魄。

在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张新颖看来,《天鉴》最大的特点是,它将作者的多重

书话

身份、一个人在生活和工作中扮演的不同角色进行了自然而然的融合。张新颖说,在《天鉴》中,罗崇敏很自然地将自己身为父、身为地方官员以及身为一个读者、一个善于思考的人的角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表达的是“个人”对于一事一物的感受,但又在字里行间展现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理想,从而展现了作者完整的人类理想。

《天鉴》作品研讨会在长沙毛泽东文学院举行期间,来自湖南清华大学和社会科学界的专家们从各个方面对《天鉴》作出了评价。著名诗歌评论家、湖南师范大学名誉教授李元洛认为,罗崇敏关注人,首先关注他自己,自身的长处与弱点,自身的资质与目标。他提出了“天鉴”,看上去心气很高,其实是取法乎上,用自然气韵和哲学之精神充盈自己的心胸,他勤学、苦练、博览、笃行,一方面是改革的大刀阔斧,一方面是心灵的宁静致远,见雄奇于淡远。

重建话语系统 盛天下列鉴世间事

为何取名《天鉴》,罗崇敏告诉记者,取的是“盛天下之理,鉴世间之事”之意。罗崇敏说,《天鉴》是他作为基层官员二十多年的一些学习心得、生活体验和履职感悟,涉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罗崇敏认为,自己的这本书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了话语系统的重建:“我注重话语的质量与权力。话语系统,一个人在生活和工作中扮演的不同角色进行了自然而然的融合。张新颖说,在《天鉴》中,罗崇敏很自然地将自己身为父、身为地方官员以及身为一个读者、一个善于思考的人的角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表达的是“个人”对于一事一物的感受,但又在字里行间展现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理想,从而展现了作者完整的人类理想。

成一家之言 大道至简天人共鉴

相对于作者从前的长篇大论,逻辑严密考证精详的长文、专著,《天鉴》一书在文体上别具一格,多为短文、札记、随笔、随想、谈话录……这种札记体文字,长则千余字,短则三五十字,却能精辟说明一个问题,这些妙趣与思想信息并重的文体,交织着思想性、文学性、哲理性。

奇人、奇书、奇作者

——《井中奇书考》增订本序言

■ 来新夏

将宋亡前后,抒发奇气伟节之作,合为一书之汇编,共收诗250首,杂文14篇,前后自序5篇。当时未获刊行,直至宋亡后四年,始将《心史》藏于苏州承元寺古井中。历时350余年,始于明崇禎十一年被发现,一时为之轰动,读其书者无不为其内容之奇而感慨激动。深藏水中数百年,复能令人观其全貌,亦一奇迹,是以福康称此《心史》为。不仅福康奇,发现奇,而且刊刻奇,内容奇,作者奇,更奇的,大概还数它问世后的遭遇之奇”,称之为奇



现在的状况是普遍不注重话语质量,文章很多,但传达的新信息很少。我们必须理性地建筑自己的话语系统,客观公平地提供信息和思考。”

在《天鉴》一书中,《中国应建设“三治”行政体系》,《边疆要有中心意识》,《经济全球化的理解》,《怎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论创新》,《最需要的常识》,《治国理政履职创业的根本是知人善任》,《关于霸气与霸道的辩证》等等,均是媒体和行政僚属之间传扬一时,重估话语体系的篇章。

对于眼下的教育改革,罗崇敏表示,“一个民族潜伏的最大危机不是经济危机,而是教育危机。教育危机是国家最大的危机。”罗崇敏表示,中国必须建设以人为根本的公平价值教育体系,而不能盲目迎合当前的社会需求。

成一家之言 大道至简天人共鉴

相对于作者从前的长篇大论,逻辑严密考证精详的长文、专著,《天鉴》一书在文体上别具一格,多为短文、札记、随笔、随想、谈话录……这种札记体文字,长则千余字,短则三五十字,却能精辟说明一个问题,这些妙趣与思想信息并重的文体,交织着思想性、文学性、哲理性。

书,谁曰不宜?

奇作者谁(井中奇书考)之作皆福康先生也。福康钻研其书二十年,实为前贤洗冤定论。其痴迷于学术和个人理念,与世之好奔竞者比照,足称一奇。福康所著无一事无出处,无一字无来源。并称著述之方法乃在考证,并以考证为学术。而大声疾呼“亟需为考证本身洗冤”,公然与世风相忤,当又奇一。福康之著此书也,所序者多为习见书,而征引之富,尤令人瞠目。其论断论理,无不实事求是。衡之浮躁者,偶得一二,便大发雄论,实难以称奇,此亦可称一奇也。有此三奇,福康亦可称奇作者矣。

老人被“公证死” 谁来公证公证处?

刘鹏

何淑芹1997年4月21日才因病死亡,可是其前儿媳在为自己的女儿即老人孙女办理相关财产继承手续时,却发现,早在1999年,婆婆就已经死亡。财产也悉数给了自己的前夫和其现任妻子。更让人蹊跷和不解的是,老人尚在人世,公证处竟然出具了其死亡的公证书。(7月21日正义网)

在上百万元的房产面前,老人的儿子没有能守住孝道精神,老人于是被公证死亡。很明显,这是中国传统孝文化在一些人思想里,被严重矮化和践踏的事实案例,是孝道的悲哀。但除此之外,公证部门虚假“公证死亡证明”,也折射出中国公证制度的诸多乱象。

公证作为一种司法证明,是法律的有力补充。但从目前频频出现的假公证情况来看,像“谁来审计审计局”一样,公证也面临着一个个现实与迫切地难题:谁来公证公证处?

法律在赋予公证处做公证这一司法证明的权力时,却同时也把公证部门不能秉公而行的法律风险转移给了社会。于是,绝对的权力导致了有可能存在的巨大公证漏洞。比如何淑芹老人被“公证死”事件,无论有什么样的原因,公证部门都无法在一个老人尚活在人世时,对其作出已经死亡的司法证明。这其中的制度漏洞和有可能存在的诸多猫腻,呼吁我们,应尽快建立针对相关公证制度的法律约束,将公证处的公证行为置于阳光之下,置于严格的监督制度之下。

谈教育“史今的教育工具功绩”

罗崇敏语录:“人类社会最大的危机不是经济危机,而是教育危机。”

罗崇敏在全国率先提出“三生教育”,即生命、生存和生活教育,倡导教育有爱。如今全国13个省市都在进行推广学习。

“当一个孩子离家出走,在外饿了吃了陌生人的面,他会感激一辈子,那为何他不能感激为自己煮了十几年的父母?”罗崇敏认为,这是社会、孩子、家长共同的过错,现今的教育工具功绩,家长培养孩子上名校也是为了光宗耀祖,忽略了对爱和生命的教育。

教育有哪些缺失?罗崇敏说:“全国有几十位高考状元,但通过追踪调查,其中却没有出顶尖的精英人才,那是因为当代教育负担太重,单一的考试让文化流失,让创造力流失。人类社会最大的危机不是经济危机,而是教育危机。”“中国的高考制度不进行颠覆性改革,素质教育是一句空谈。”

福康所著问世后,颇获好评,而福康犹以为尚有不足,继续孜孜探求,深挖史料,所增补新内容,大多为前人所未道及者。先祖来福康先生自二十世纪初投身民族民主革命,其缘由盖受前人行事之影响颇深,如庚子之变,华夏大地遭八国侵扰,先祖即读郑氏《心史》以自励,并写有诗作云:

“偶然掘井说姑苏,心事当年最足吁。闻说崖山方死节,可怜信国又捐躯。此身早已随流付,独力犹思大厦扶。何日虏氛消塞北,长城屹屹强胡。”(《井中奇书》见《抱园诗集》卷十二,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一史料我从未与福康言及,即此可见福康涉猎之广,挖掘之深。修订工作年内可望完成,将增全书三分之一,成一60万字巨著。愿地下有知,亦当谢词而已。我虽年近耄耋,犹愿与诸君子预祝福康新著之早日问世,以饷读者。